

THE POETRY OF
THE EARLY T'ANG

初唐诗

〔美〕斯蒂芬·欧文 著

贾晋华 译

广西人民出版社

初唐詩

T' ANG · [美] 斯蒂芬·欧文著 · 贾晋华译 ·

初 唐 诗

〔美〕斯蒂芬·欧文 著

贾晋华 译

☆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8 875印张 插图2 211千字

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4,500册

书号：10113·495 定价：1.95元

ISBN 7—219—00464—8

I·110

序

傅璇琮

自从欧洲的第一批耶稣会士抱着传教的虔诚，越过重洋，在明朝末年来到中国，开始接触中国的社会和文化，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研究，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如果按照《国际政策的文化基础之研究》作者诺思罗普(F. S. C. Northrop)所说，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分歧不在于政治而在于文化，这种分歧深深植根于各自传统的不同概念之中，那末，四百多年来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固有精神和价值的探索，实际上可以说是两种或两种以上文化的互相认识和补充。这也构成了近代世界史上文化交流的丰富繁复的图象。尤其是作为东方大国的中国，它的悠久的历史文化被世界所认识，以及这种认识的日益深化，本身就是文化史上令人神往的课题。从这个背景上说，斯蒂芬·欧文先生的成名作《初唐诗》被介绍到中国来，它的意义就不仅仅是中国学术界增加一本优秀的汉译名著，而且还在于它是文化交流的链条中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环节。

在探索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的认识过程中，我们不应该忘记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1920)。他的思想和著作日益受到中国读书界的注意，特别是近几年显得十分突出。是他

扬弃了在他之前的欧洲学者的共同学风，即服从于自己的时代背景和相应的要求，按照西方人的思想模式来理解中国的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正是从韦伯开始，主张应当密切联系社会历史的实际状况来研究观念的形成和演变轨迹。这就为尔后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格局，那就是要对中国的文化真正有所了解，就应当探求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发展的历史背景，努力依循中国人的思想方式来进行课题的研究。这种情况，特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学者那里，表现得更其明显。

关于美国学者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就我所看到的材料，美国密执安州立大学人文系及语言学系教授李珍华博士的《美国学者与唐诗研究》（载《唐代文学研究年鉴》第一辑，1983）是最清楚、概括的一篇。这篇文章讲的虽然是美国的唐诗研究，实际上足以反映美国于本世纪50年代以来汉学研究的巨大进展。我们只要比较一下上一世纪同一时期法国学者对中国那些平庸的言情小说《平山冷燕》、《玉娇李》的推崇，和本世纪近三十余年来美国学者（包括美籍华人学者）对唐诗、宋词及明清小说的认真探讨，相距真不可以道里计。日本对于中国文学的研究，往往以绵密的材料考证见长，而美国在这方面却常以见识的通达和体制的阔大取胜。

正是从李珍华先生的文章中，使我知道欧文先生在唐诗研究中取得的成就。李珍华先生把欧文先生列为美国的中国文学研究的第三代学人，而称为“特别值得一提”，并推许出版于1977年的《初唐诗》为“一本杰作”，说“把整个初唐诗作一系统性处理，欧氏可以说是第一人”。李珍华先生对欧洲文化与美国文学均有深邃的认识，而又对唐诗、特别是初盛唐诗有较深的把握，因此我想他的话是可信的。由于我参与《唐代文学研究年鉴》的编辑，较早读到其中的文稿，因此李先生特别提及的欧文先生著作

给我的印象很深，并盼望能早日见到全书的中文译本。现在依靠贾晋华同志的努力，这个愿望得以实现，甚感欣慰，我想我们国内的唐诗研究者也会从这一译著中获得启发。贾晋华同志前数年从厦门大学周祖谟先生研治唐代文学，她的硕士学位论文论皎然《诗式》及大历时期江南诗风的特点，也给我很深的印象，她的从文学演进的内部规律与外界社会文化思潮相互影响的研究，与欧文先生的治学，也确有不谋而合之处。以贾晋华同志对唐诗所具有的修养来从事于本书的翻译，必能准确表达原书的胜义，这应当是无可怀疑的。

在过去一个很长时期中，初唐诗的研究在我国整个唐诗研究中是一个极为薄弱的环节。初唐，如果把下限定在睿宗时，那就是足有九十年的光景，占了唐代历史的三分之一。如果对于这一阶段文学研究不足，就不可能充分说明盛唐的高潮。对这九十年时期的文学，过去的论著往往只停留在一个笼统的认识，细节研究非常缺乏，这种情况在最近四、五年内才有所变化。作为近体的律诗，到底是经过什么样的轨迹一步步地成熟的？古诗，特别是盛唐、中唐时一些大家所擅长运用的七古，怎样从南北朝的涓涓细流，经过初唐作家的多方尝试和大胆变革，而汇成长江大河，这中间有什么规律和经验可求？由“四杰”而陈子昂，而沈、宋，是怎样一步步递嬗演进的？当时的社会思潮、文化氛围给予诗人和诗风以什么样的影响？初唐时期几个帝王的宫廷政治和文化生活，赋予文学风格以什么样的特色？这些，都需要作细致的分析。而近几年来我国初唐文学研究的进展，也正是在这些方面作出了令人瞩目的探讨。从这一研究的历史背景来看，欧文先生作于1977年的这本《初唐诗》，在中国学者之先对初唐诗歌作了整体的研究，并且从唐诗产生、发育的自身环境来理解初唐诗特有的成就，这不但迥然不同于前此时期西方学者的学风，而且较中国学

者早几年进行了初唐诗演进规律的研究。虽然近几年来中国学者的论著在不少方面已作了深入的挖掘，大大加快了初唐文学研究的进程，但欧文先生的贡献还是应该受到中国同行的赞许的。

我们高兴地看到，在《初唐诗》之后，作者又于1981年出版了《盛唐诗》，更进一步论述了初唐与盛唐的关系，并对盛唐诗人作了使人感兴趣的分类（如把张说、张九龄、王维作为“京城诗人”，把孟浩然等作为“非京城诗人”，把王昌龄、高适、岑参作为处于两者之间的诗人，“京城诗人”多用律体，“非京城诗人”多用古体）。欧文先生近年来的研究格局似更为放开，由论述诗歌创作进而研讨诗歌理论。他说他更强烈地感觉到诗歌中那些无法为文学史所解释的方面，他仍然相信文学史是基本的，但它需要由对诗歌的其他方面的探讨来补充。为此，他又撰写了关于中国诗论的论文，结果结集八篇文章，起名为《传统的中国诗歌和诗论：一个预言的世界》，于1985年由威斯康辛大学出版。紧接着又是一组八篇文章的集子，《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心得》，哈佛，1986。他自己说这八篇文章是一种反系统的处理，将互不相关的作品放在一起考察，尝试着使单篇的诗作和散文焕发出生命力。这样做，作者也抱着一种希望，这就是打破美国的中国文学狭窄阅读圈子，寻求更多的读者。

欧文先生的学术著作在其已经完成尚未出版的《中国文学思想读本》中，更有新的进展。他认为，过去大部分论述中国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英文著作，都倾向于运用现代西方文学理论术语，而在他的这部近著里，却试图向英语读者表明，作为中国诗歌基础的概念和趣味，与西方是不同或不完全相同的，各种传统的文学思想都具有伟大的力量，但是这些力量是各不相同的。欧文先生的这一认识确值得赞许。这是对不同民族传统文化传统充分尊重的态度，只有持这种态度，才能达到真正清晰的理解。这是一个

严肃的学者在独立的研究中摆脱西方习以为常的观念所必然产生的结果，是一个富有洞见的认识。

近十年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已取得可观的成绩。但人们对研究现状仍不满意，这种不满意是多种多样的。在我所接触的一些研究者中，越来越感到对古典文学的研究结构需要有所反省，这就是说，研究结构存在不合理的情况。有些课题投入的力量多，成果却并不多，许多情况下往往是一窝蜂，赶热门，结果却出现了不少缺口，这就必然影响总体水平的提高。这是一个需要详细论证的问题，不是这篇短序所能承担的。由欧文先生的著作，使我进一步感到，作为古典文学研究结构中的问题之一，就是我们对国外学者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现状的了解，是多么的不够。我相信，在美国、日本、欧洲以及其他一些地区，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有价值的著作，一定还有不少，它们以不同的视角来审视中国的独特的文学现象，定会有不少新的发现，即使有的著作有所误差，也能促使我们从不同的文化背景来研究这些误差的原因，加深我们的认识。如果我们能有计划地编印一套汉译世界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代表作，肯定会受到中国学术界和读书界的欢迎，也将会对我国古典文学研究结构起到积极协调的作用。这是我个人作为研究者之一所深深期望着的。

1987年3月于北京

致中国读者

斯蒂芬·欧文

从事任何学术工作，首要的是牢记各种局限：研究者本身的局限，及其所研究的学术类型的局限。回顾这本写于许多年前的书，我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各种局限。在过去的15年中，中国出版了许多关于初唐诗的出色论著，而我在撰写这本书时，却未及从这些论著中获益，这是十分遗憾的。但是另一方面，这些同样的局限也给了我自由，使我得以从崭新的视角观察这一时期；如果我是在今天撰写关于初唐的书，那就肯定要困难得多。各种学术传统对于同样的问题可以给出不同的答案，它们都建立了极大的发展趋势。年轻学者一旦进入这样一种传统，往往难于避开那些公认的问题。然而，有时却有必要提出新问题，或以新的方式阐述旧问题。在学习和感受中国语言方面，中国文学的西方学者无论下多大功夫，也无法与最优秀的中国学者相并肩；我们唯一能够奉献给中国同事的是：我们处于学术传统之外的位置，以及我们从不同角度观察文学的能力。新问题的提出和对旧问题的新回答，这二者具有同等的价值。

前面提到的第二种局限是研究者所从事的学术类型的局限。与各种学术传统一样，各个研究者在他们的著作中也建立了一种

发展趋势。我在文学史上研究得越多，就越意识到我正在重新对自己反复提出那些同样的问题。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诗歌的某些方面具有中心的意义，而其他方面却黯淡无光。但是这些其他方面往往正是诗歌的“诗歌”。文学史和我个人对它的描述也可能变成一种局限。

在文学论著中，如果我们自己的思维习惯已经变得太轻快自如，那就很有必要脱离它们。文学论著所传达的不仅是一种认识的结构（例如，文学史的一种模式），而且还包括个别学者完成这一结构的途径，发现的兴奋，思考解决问题的方式。在学术著作中，就象在文学作品本身一样，任何优秀的读者都能够辨别出作者从呆板的、学术的程式中获得的快乐。我在撰写这本书和关于盛唐的那本书时，就感到了这种快乐。但是，即使是最出色的认识结构，如果成了惯例和陈套，就会变得呆板乏味。脱离自己辛苦获得的成果是十分可惜的，但又是必要的。

因此，近年来我一直将文学史搁在一旁，试图精细地探讨中国诗歌那些无法为文学史所解释的方面。对于诗歌来说，文学史就象是“门厅”，人们只有通过它才能到达诗歌；但是，它本身并不理解诗歌。我希望有一天将带着新的视野回到文学史。

我撰写这本书的初衷是为盛唐诗的研究铺设背景，但是我却发现，初唐诗比绝大多数诗歌都更适合于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研究。孤立地阅读，许多初唐诗歌似乎枯燥乏味，生气索然；但是，当我们在它们自己时代的背景下倾听它们，就会发现它们呈现出了一种独特的活力：从公主宴会上洋洋得意地呈献的有着完美对句的一首诗，到陈子昂的大胆论辩。在阅读作品时补上这个背景，既需要学识，也需要一种想象的行动，一种“它在当时应该是什么样”的强烈感觉。当我们确实在阅读中补充了这样的背景，初唐诗就不再仅仅是盛唐的注脚，而呈现出了自己特殊的

美。

我衷心感谢贾晋华为翻译这本书所作的努力。我希望这本书至少能够向中国读者表明：中国诗歌的爱好者遍于全世界。

康科特，马萨诸塞

1987. 1. 11.

译者注：

斯蒂芬·欧文，1946年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城，1968年毕业于耶鲁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1972年获博士学位，其后相继执教于耶鲁大学、哈佛大学，现任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中国和比较文学”教授。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的主要研究著作有：《韩愈与孟郊的诗》，耶鲁大学出版社，1973；《初唐诗》，同上，1977；《中国诗歌的伟大时代——盛唐》，同上，1981；《传统的中国诗歌和诗论：一个预言的世界》，威斯康辛大学出版社，1985；《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心得》，哈佛大学出版社，1986。

导 言

中国诗歌史上的初唐时期，从公元618年唐朝建立开始，大约至713年玄宗即位时。初唐诗歌本身并没有呈现出统一的风格，它只是结束了漫长的宫廷诗时代，缓慢地过渡到新的盛唐风格。宫廷诗的传统处于7世纪的变化中心。“宫廷诗”在这里特指南朝后期、隋及初唐宫廷的诗。虽然在此前后，宫廷中也作诗，但只是在5世纪后期及6、7世纪，宫廷才真正成为诗歌活动的中心。在这一时期里，不但写于各种宫廷场合的诗在现存集子中占了很大比例，就是那些写于宫廷外部的诗，鲜明的“宫廷风格”也占了上风。

到了7世纪前半叶，宫廷风格日益变得矫揉造作、僵化刻板，强烈的对立倾向得到了发展，或修正宫廷风格，或寻觅替代的诗风。随着诗人们越出宫廷诗严格控制的主题和题材，诗歌的范围开始扩大。此外，宫廷诗修饰技巧对创作过程的严格控制也减轻了。通过这些变化，加上其他一些方式，7世纪后期、8世纪初期的诗人在保留旧诗歌许多优点的同时，获得了新的自由。

文学自由应该从反面加以解释。本来就存在标准与惯例的背景，作为诗人突破的对象。从7世纪后期起，宫廷诗的各种惯例开始发挥这样的功用：形成诗歌的期待群，成为优秀诗人得心应手的表达工具。8世纪中期的诗歌，即盛唐诗，经常被描绘成

“直率”、“自然”。这些特性从来不是文学的本性，盛唐诗歌之所以呈现出这些特性，是由于有7世纪诗歌的衬托。

这本书研究的就是这些标准与惯例，以及初唐诗人如何突破它们，如何学会利用它们为自己的目标服务。虽然这里的研究局限于初唐诗，但是这些同样的标准与惯例也形成了8、9世纪诗歌的隐蔽背景。8、9世纪的诗人甚至比初唐后期的诗人更善于运用这些惯例与传统。尽管他们不喜欢初唐诗，赞美宫廷诗时代之前的“古风”，然而在实践上，他们依靠的仍然是发展于7世纪的处理法则。

8世纪对初唐诗的偏见持续了一千多年，直至目前，甚至在中国与日本，有关初唐诗的研究论著寥寥无几。现存的论著主要是关于个别诗人或声律发展的研究，较大部头的文学史著作通常只限于评价这一时期的重要诗人，阐述初唐诗风与南朝诗风的关系。没有人试图对这一时期进行广泛的、整体的探讨，追溯此时在诗歌方面发生的重要变化。

这里的研究略去了最有趣的两个诗集，至少是其中写于初唐的部分，即寒山与王梵志的集子。这一删略是很可惜的，但却是必要的，因为他们的作品离开诗歌传统的主流太远，而且在系年及真伪方面存在许多问题。如果探讨这些问题，势必会分散对这一时期实际的文学史问题的注意力。此外，也没有迹象表明他们的作品曾为当时的都城诗人所了解。另一位诗人王绩的作品，表面上看与寒山、王梵志的作品相似，却包括在这本书里，这是由于他的作品表现了对宫廷诗传统的自觉反抗。我还将刘希夷和张若虚忽略不计，他们的作品完全属于8世纪初期，却经常被误认为初唐诗人。¹

这里需要说明书中正文及译文的一些凡例。由于量度在诗歌中难得被精确运用，所以我随意地以英制不精确地代替汉制，例如

将“一里”译成“一英里”。我保留了中国人计算年龄的方法，即婴儿一出生就是一岁。我还把中国的阴历纪年换算成大致的西历纪年，例如景隆三年十二月，若精确地换算，已经进入710年，却仍然称为709年。

与任何试图包括大量资料的著作一样，我尽力保持最低限度的注释。对于诗中的典故出处，只有在属于讨论范围，或必须了解诗歌字面的意思时，才加以解释。中国诗歌的本文往往是折衷的，其中那些夹有评注的本文很有用，如陈子昂诗歌的评注，我就采用了不少。《文苑英华》所录经常是现存唯一的、最早的本文，但《文苑英华》的质量众所周知是很粗劣的。在没有其他合用的早期版本的情况下，我就拿《文苑英华》的异文与《全唐诗》相校，除非《全唐诗》纠正了明显的谬误。我所引用的本文，往往综合了数种原始资料。除了出现特别的问题，这里将不讨论各种异文。为了方便那些需要查找各种早期本文及未翻译诗篇的读者，我根据日人平冈武夫等编纂的《唐代的诗篇》，标出了《全唐诗》的编码数字。

初唐年表

618—626	高祖
627—649	太宗
650—684	高宗（655立武则天为皇后）
684	中宗（即位仅一月就被武后废黜）
684—690	睿宗（即位仅两月就被武后放逐，武后在其年号下摄政）
690—705	武后（690正式废黜睿宗，改国号为周）
705—710	中宗（第二次即位。武后引退，复周为唐；韦后及其家族不久就掌握政权，710鸩死中宗）
710—712	睿宗（第二次即位。依靠临淄王，即后来的玄宗而复辟，712让位）
712—756	玄宗（756后与肃宗共称帝，但实际上已退位）

目 录

导言

初唐年表

第一部分 宫廷诗及其对立面

1. 宫廷诗的时代..... (1)
2. 对立诗论与隋代..... (8)
3. 隋代的遗老：魏征与李百药..... (16)
4. 太宗朝的诗人..... (25)
5. 王绩..... (36)
6. 上官仪..... (42)

第二部分 脱离宫廷诗：660——670

7. 初唐四杰..... (46)
8. 卢照邻：宫廷诗的衰退..... (48)
9. 都城诗..... (60)
10. 王勃：新的规范..... (71)
11. 骆宾王：诗歌与修辞..... (81)

第三部分 陈子昂

- 引子..... (88)
12. 陈子昂的诗歌生涯..... (99)
13. 《感遇》..... (106)

第四部分 武后及中宗朝的宫廷诗：680—710

引子	(133)
14. 文学机构	(135)
15. 在708年怎样写宫廷诗：结构、格律、题材	(136)
16. 宫廷生活中的诗歌	(150)
17. 高氏林亭的私人宴会	(160)
18. 宫廷咏物诗	(164)
19. 其他应酬题材	(170)
20. 武后时期的新歌行	(176)
21. 杜审言	(188)
22. 沈佺期	(196)
23. 宋之问	(211)

第五部分 张说与过渡到盛唐

引子	(221)
24. 张说	(223)
25. 进入盛唐	(239)
附录1 宫廷诗的“语法”	(247)
附录2 声调格式	(251)
附录3 关于文献目录、作品系年及资料选择	(254)
注释	(257)